

环境伦理学的现代建构及其发展趋势

杨通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伦理学是一门探讨伦理和道德的古老学科。在古代社会和许多非西方文化传统中,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曾经是伦理学的一种重要使命。然而,受机械论自然观和二元论的影响,近现代西方的主流伦理学却忽视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维度,甚至否认人对自然本身负有的伦理义务。在许多哲学家看来,这是导致现代环境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因而,从伦理学的角度重新思考人对自然的伦理义务,就成为了新兴的环境伦理学的重要使命。梳理环境伦理学的现代建构历程及其发展趋势,不仅有助于扩展人们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框架,还有助于我们建构适宜于思考人对自然之伦理义务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 环境伦理学;生态神学;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建构

【中图分类号】 B82-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14)01-0022-09

一、环境伦理学的现代建构

20世纪60—70年代,全球工业文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这些危机具体表现为环境污染(如空气和水土污染、固体废物污染以及有毒化学品污染)、资源短缺(如能源短缺、耕地减少、矿藏枯竭)和生态失衡(如物种加速灭绝、生物多样性锐减、人口暴增等)。对于这种黯淡的前景,很多人士深表担忧。在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年)、保罗·艾里奇的《人口爆炸》(1968年)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1972年)等著作的启蒙和影响下,人们的环境意识开始觉醒。1970年4月22日,200多万美国人举行了反对污染、保护地球的游行示威。此后,这一天被定位为地球日。1971年,以反对核武器和保护环境的绿色和平组织成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全球范围环境意识的普遍觉醒。这些事件的发生为环境伦理学的现代建构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和文化基础。

1. 生态神学的建构

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环境危机使人们认识到,环境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即不是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就能解决的问题。雷切尔·卡逊在献给史怀哲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就指出,征服自然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与现代环境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类只有接受史怀哲提出的“敬畏生命”这一伦理信念,在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以尊重为基础的和谐的关系,才能有望从根本上解决危及人类文明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问题。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怀特在1967年发表的论文《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中进一步深化了卡逊的论点。在怀特看来,导致西方环境危机的根源,是正统的基督教传统。根据基督教的神圣传统,人是大自然的主人,而非其成员。由于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是唯一拥有灵魂、并有望获得上帝拯救的存在物,因而,人明显地高于其他生命形式;其他的创造物都仅仅是为了人的利益而存在的。怀特认为,“基督教是这个世界上人类中心

* 【收稿日期】2013-11-20

【作者简介】杨通进(1964-)男,贵州剑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环境伦理学。

主义色彩最浓的宗教”。基督教不仅确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论,它还坚持认为,为了人的恰当目的而掠夺自然,这是上帝的意志。“因此,除非我们拒斥那种认为大自然除了为人服务以外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的基督教信条,否则,我们的生态危机就只会越来越严重”^[1]。

怀特的论文在当时曾引起轩然大波。保守的基督徒称他为“年少气盛的反基督徒,可能领了克里姆林宫的赏金,处心积虑要摧毁真实的信仰”。激进的、甚至温和的环境主义者则对怀特的观点表示热烈的欢迎。怀特的论文也唤醒了许多基督徒,使他们更多地关注所谓“自然神学”的问题。有的学者部分赞同怀特的观点,但认为,《圣经》对人与自然的的理解并不完全是统治性的,《圣经》也把人类理解为地球的托管人;地球是上帝赠给人类的礼物,人类应细心地加以看护^[2]。社会学家蒙克理夫则指出,怀特的分析过于简单化,因为导致我们目前出现生态危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民主制、技术、城市化以及对自然的侵略态度,因此把基督教视为我们生态危机的唯一根源,显然是缺乏根据的^[3]。阿提费尔德也认为,不能把目前出现的生态危机的账算在基督教的头上^[4]。

受怀特论文的启发,许多神学家开始重新阐释基督教对自然的态度,重建基督教的“托管传统”与“合作传统”,于是,基督教的“绿色化”过程开始了。1970年,闪特米尔出版了《地球兄弟:危机时代的大自然、上帝与生态学》一书。该书试图用犹太—基督教的上帝之国(Kingdom of God)的古老观念来支持伦理范围的扩展。在《为时已晚?生态神学》(1972年)一书中,科布基本上接受怀特的这一观点:基督教要对西方的环境危机负主要责任。但他反对怀特提出的东方宗教有可能为解决环境危机提供药方的观点,认为重建基督教传统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纳什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整整一代宗教思想家都加入了闪特米尔和科布的行业,在发展和普及环境伦理学方面做出了非常引人注目的贡献。到了20世纪80年代,“从神学院到邻近的教堂,愈来愈多的人都认为,人与自然的

排除在宗教伦理学之外。‘生态神学’不再只是一个新词,而变成了一种非常有生命力的世界观”^[5]131-132。

2. 人类中心主义的建构

1971年,关于环境问题的第一次哲学会议在美国佐治亚大学举行,与会者希望他们的工作能够成为“发展一种环境伦理的哲学序幕”。尽管这次会议的文集《哲学与环境危机》延迟到1974年才出版,但这却是哲学学科关注环境问题的破冰之旅。作为会议组织者的布莱克斯通提交给大会的《伦理学与生态学》一文认为,“拥有一个可生存的环境”是人所拥有的一种新的“人权”。布莱克斯通承认,未来人也拥有这种权利,但权利只与人有关。因此,他仍然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内来谈论环境伦理问题^[6]。澳大利亚著名哲学家帕斯莫尔在《人对自然的责任:生态问题与西方传统》(1974年)一书中认为,对非人类中心主义道德的呼唤是“神秘主义的无聊思想”。在他看来,人类之外的存在物不是内在价值和道德权利拥有者。他认为,“贪婪和短视”是导致现代生态灾难的主要原因;只要接受传统道德的约束,这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传统的道德足以证明我们关心生态系统的行为的合理性,无须践履其他的道德”^[7]186。他希望人们能够从美感的角度来理解自然,“只要人们学会了从美感的角度来欣赏这个世界,他们就能学会关心这个世界”^[7]187。帕斯莫尔的观点得到了诺顿、哈格洛夫等人的支持。诺顿在《为什么要保护自然的多样性?》(1988年)、《走向环境主义者的联盟》(1991年)等著作中,把大自然所具有的满足人的理性偏好与改变人的价值观的价值作为制定环境保护政策的基础。哈格洛夫在《环境伦理学的基础》(1989年)一书中则认为,自然是美丽的,美好的。对人来说,自然的审美价值是一种内在价值,尽管这种价值是以人类为中心的。道德代理人有义务保护和促进自然界的这种内在价值,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应以大自然的这种审美价值为基础。哈格洛夫的这种观点,无疑是关于自然的工具主义观点与内在价值观点之间的一种折中^[8]。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重新理解和建构人

类中心主义的著作逐渐增多。英国学者海华德在《政治理论与生态价值》(1998年)一书中区分了物种歧视主义、人类沙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这三个词的不同含义。在他看来,那些被放在人类中心主义名下加以批判的理论,其实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物种歧视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虽然物种歧视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是错误的,而且也是可以避免的(尽管要真正避免人类沙文主义非常困难),但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却是不可反驳、不可避免、甚至是值得期待的。因为,人类中心主义是任何伦理学理论都不可或缺的部分,人们不可能去做那些他们认为不符合其利益的事情。环境伦理学需要做的,不是笼而统之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要把人们的合理的利益与不合理的利益区分开来,并把尊重自然理解为人类自我实现的重要部分^[9]。

3.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建构

①动物解放/权利论的建构。布莱克斯通主持的第一次环境哲学大会的基调虽然是人类中心主义,但范伯格提交的《动物与未出生的后代人的权利》一文,却是“后来关于扩展权利范围的合法性的大规模哲学研究的里程碑”(纳什语)。范伯格认为,一个存在物只要拥有利益,它就拥有权利。动物也拥有利益,因而动物也拥有权利。范伯格的这一理论成为许多人(如沃伦)证明动物拥有权利的根据。

1971年,斯坦利、古德洛维奇和哈里斯编辑了《动物、人与道德:关于对非人类动物的虐待的研究》一书。这是第一本以纯正的哲学语言讨论动物权利问题的现代著作。1973年,澳大利亚哲学家辛格在美国的《纽约书评》上以“动物的解放”为题,对《动物、人与道德:关于对非人类动物的虐待的研究》一书进行了评论。辛格高度评价了该书作者的基本观点,使物种歧视主义这一概念广为人知。两年后,为了全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也为了回应由该文引起的激烈争论,辛格把“动物的权利”一文的思想扩展成了一本书——《动物的解放》,该书被视为现代动物权利运动的“圣经”。在此后的《实践伦理学》(1979年)、《动物工厂》(1980年,与马逊合著)、《扩展伦理的范围:伦理

学和社会生物学》(1981年)等著作中,辛格进一步阐述了“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这一伦理原则。

在关于动物权利及其含义的讨论中,就其所写论文的数量和对思想界产生的影响而言,美国的雷根与辛格旗鼓相当。和辛格一样,雷根也于1972年开始思考扩展伦理范围的问题。他在1973年就撰文指出,和人一样,动物也很看重它们自己的生活,因而也拥有“内在价值”和“一种对于生命的平等的天赋权利”。他于1979年写到,“就像黑人不是为白人、妇女不是为男人而存在的一样,动物也不是为我们而存在的。它们拥有属于它们自己的生命和价值。一种不能体现这种真理的伦理学将是苍白无力的”^{[5]173}。因此,在实验室和畜牧业中残酷地对待或杀害动物是错误的——这并不是由于这种行为会给人带来有害的影响(如大多数仁慈主义者所相信的那样),而是由于它侵犯了动物的权利。纳什认为,雷根的《为动物权利辩护》(1983年)一书“是目前从哲学角度最彻底地反思‘动物权利’这一问题的著作”^{[5]173}。

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关于动物的道德地位问题曾是环境伦理学关注的一个主要话题。声誉极高的杂志《伦理学》(1978年10月号)和《探索》(1979年夏季号)都以整期的篇幅关注动物的道德地位问题。《伦理学与动物》杂志则完全以这一问题为主题刊发文章。各种会议把处于这一领域前沿的理论家聚集在一起,并通过出版诸如《动物权利:专题论文》、《伦理学与动物》这类文集而把会议的成果传播开来。探讨与动物有关的伦理问题的学术著作也纷纷出现。

②生物中心主义的建构。1923年,史怀哲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但是,他把对生命的敬畏建立在生命所具有的“生存意志”基础之上。对生命的这种理解带有很强的心理主义色彩。为避免这一局限,现代的生物中心主义者试图为关心生命提供不同的伦理基础。1979年,美国圣母大学哲学系教授古德帕斯特发表《论道德关怀》一文,区分了“道德关怀”与“道德重要性”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并认为,所有的生命都拥有需要和利益;生命所拥有的这种需要和利益,是它们应当获得道德

关怀的充分条件^[10]。

1981年,英国学者阿提费尔德发表《论树木之善》一文,认为不具有苦乐感受能力的生命也拥有自己的善,因而也拥有道德地位,应获得道德关怀^[11]。在《关心环境的伦理学》(1983年)和《环境哲学:原则与展望》(1994年)两本著作中,阿提费尔德进一步从他的实践后果主义的角度论证了生物中心主义的基本观点。在阿提费尔德为所有生命的道德地位进行辩护的同一年,美国学者泰勒在《环境伦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尊重自然的伦理学》一文,初步阐述了他的以道义论为基础的、平等主义的生物中心主义的基本主张^[12]。该文的基本观点在他的《尊重大自然: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1986年)一书中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

③生态中心主义的建构。1973年,澳大利亚哲学家罗特利在第十五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发表题为《是否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伦理——环境伦理?》的学术论文,这是第一篇正式提出建构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新的环境伦理的哲学论文^[13]。罗特利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西方文明有三个传统,即统治传统(人作为专制君主)、托管传统(人作为托管者)和合作传统(人作为完善者)。这三种传统都不适宜作为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伦理,因而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伦理,即环境伦理。这种伦理不是简单地把某些重要的环保概念(如资源保护、污染、增长、环境保护)引入伦理学中来,而是要在元伦理学的层面重新审视价值、权利等概念的意涵,重新确认权利的基础、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以及行为规范的原则。1979年,罗特利与其夫人共同撰写了《驳人类沙文主义》一文,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建立扫清了障碍^[14]。

1972年,美国学者斯通在《树木拥有地位吗?走向自然客体的法律权利》一文中也主张,现代社会应当把法律权利赋予森林、海洋、河流以及环境中的其他所谓自然物体——作为整体的自然环境。“斯通的伦理学体系把环境人格化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要求他的社会设计一种法律安排,以便在其中大自然能够真正像一个人那样被对待……他准备全力以赴地拓展他所属的伦理共同体的边界,扩大作为美国自由主义根基

的洛克式哲学的范围。他的最终目标是要‘把环境当做一名权利拥有者引入社会’”^{[5]156}。斯通还把他的论文扩展成了一本书名相同的书《树木拥有地位吗?走向自然客体的法律权利》(1974年),该书是早期建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重要文献之一。

1975年,国际环境伦理学学会的创始人艾斯特·罗尔斯顿发表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伦理学》上的论文《生态伦理存在吗?》是环境伦理学的扛鼎之作。在这篇论文中,罗尔斯顿首次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环境伦理,即原发型环境伦理与派生型环境伦理。原发型环境伦理即利奥波德所理解的大地伦理,派生型环境伦理即把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建立在人的利益这一基础之上的伦理。罗尔斯顿指出,把对生态系统的关怀仅仅归结为对人的利益的考量,是难以准确把握现代环境主义运动的道德倾向的;把生态伦理都理解为变相的人类利益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人们走向派生意义上的生态伦理还可能是出于对他们周围这个世界的恐惧,但他们走向根本意义上的生态伦理只能是出于对自然的爱”^[15]。在《环境伦理学:自然界的价值以及人对自然界的义务》(1988年)这本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经典之作中,罗尔斯顿以对自然的客观价值的确认为基础,系统地论证了人对动物、生命、物种与生态共同体的义务^[16]。

对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的建构而言,1973年,挪威哲学家纳斯发表的论文《肤浅的生态运动与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在该文中,纳斯首次区分了肤浅的生态运动与深层的生态运动,批判了浅生态运动的改良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性质。他还认为,浅生态运动的实质是维护发达国家的富人的利益;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危机;深生态运动要求改变人们的深层价值观、社会制度以及人的行为模式^[17]。在《生态学、共同体与生活方式:生态哲学纲要》(1976年于奥斯陆出版第一版;1989年在由罗森伯格译为英文出版时,纳斯作了许多重要修订)一书中,纳斯对深层生态学及其哲学基础作了最充分的阐释。纳斯明确指出,深层生态学不仅仅是一种伦理学,更是一种关系本体

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这种本体论和方法论要求我们把事实、情感和价值整合进我们对世界的基本理解中,它们为我们实现与所有实在的更为宽广的认同奠定了基础。

1985年,德维尔和塞欣斯的《深层生态学:与大自然共同生活》提纲挈领地阐述了深层生态学的基本主张,明确把深层生态学运动理解为一种批判并超越近现代技术文明、实现人类文明转型的影响深远的运动。该书使得深层生态学的基本观念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广泛传播。

总之,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1988年)的出版,环境伦理学的现代建构工作已基本完成,初步形成了以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为主的“四分天下”的理论格局,环境伦理学迎来了发展的第一个春天。

二、环境伦理学的最新动向与趋势

20世纪80年代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都已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却在全世界迅速蔓延: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日益恶化,资源短缺和核废物的阴影笼罩着全世界,地球的承载能力因人口暴增而受到威胁,物种迅速消失和森林的锐减正在给人类和非人类的生活带来破坏,臭氧空洞和全球变暖正成为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在这种令人担忧的形势下,国际社会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环境保护运动。目前,人们已经在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建立了许多保护环境的法律,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保护环境已成为了全人类的共同事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与全球环境保护运动保持同步,并更加有效地参与这一运动,环境伦理学家不断提升和拓宽其研究领域,环境伦理学也在全球范围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和发展。1990年国际环境伦理学学会在美国成立,1991年《环境价值》季刊在英国兰喀斯特大学创刊发行,1996年《伦理学与环境》半年刊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98年国际环境哲学学会和生态伦理学国际联盟分别在美国和德国成立。2004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由来自不同国家的

十名学者组成的“环境伦理专家组”,并分别于9月和11月召开了两次专家组会议,向联合国有关机构递交了旨在引导和推动各成员国加强环境伦理建设的可行性报告。这些事件与活动为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推动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舞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呈现出下述值得注意的动向与趋势。

1. 实践取向

关注环境伦理学的实践意蕴,力图实现环境伦理学理论与环境保护实践、环境运动、环保决策的沟通与结合,是90年代以来的环境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例如,诺顿的《走向环境主义者的联盟》(1991年)试图探讨不同流派的环境伦理思想在政策决策层面的共识;布朗、奎布勒主编的《伦理学与21世纪议程:全球共识的道德意蕴》(1994年)探讨了与21世纪议程有关的伦理和道德问题;加丁纳等人主编的《气候伦理学》(2010年)关注的是与气候变换有关的伦理问题^[18-19]。

环境意识与环境伦理价值观的广泛传播,还为绿色政治运动绿党兴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精神基础。在当代西方(特别是欧洲),绿党是一股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因此,绿党与环境价值观(特别是深层生态学)之间的精神联系越来越引起环境伦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帕尔克的《环境主义与进步政治学的未来》(1989年)、埃克斯利的《环境主义与政治理论》(1992年)以及克拉默的《深层环境政治学》(1998年)等就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几部代表作^①。

2. 整合与超越

各种环境伦理学流派(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在进一步完善自身的前提下,力图实现与其他流派的沟通与整合,寻求多元共存的可能性。诺顿的《走向环境主义者的联盟》(1991年)、罗尔斯顿的《保护

^①See Paehlke R.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future of progressive politic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Eckersley R. 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toward an ecocentric approach[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Cramer P. Deep environmental politics: the role of radical environmentalism in crafting America environmental policy[M].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1998; Gardiner S, Caney S, Jamieson D, et al. Climate ethics: essential reading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自然价值》(1994年)、西尔文和贝内特的《绿色伦理学》(1994年)、阿提费尔德的《全球环境的伦理学》(1999年)和普杰曼的《全球环境伦理学》(2000年)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①。90年代以来编辑的《环境伦理学》教科书(文集)几乎都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把各个时期、各个流派的代表作纳入其中。

3. 关注环境正义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许多学者发现,生活在垃圾场和污染严重地区的总是有色人种;进一步的研究也表明,有色人种和穷人总是更多地承担着环境退化所带来的苦果,而白人和富人总是比其他人群更多地享受着环境保护所带来的好处,于是,环境正义问题浮出水面,成为环境伦理学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随着发达国家把更多的重污染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把越来越多的有毒废弃物运往发展中国家,环境帝国主义与国际环境正义也开始成为环境伦理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

4. 寻求新的哲学基础

站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环境伦理学,为环境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寻求新的灵感,探索新的路径,是90年代以来环境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实用主义、现象学和美德伦理学正在成为环境伦理学家们深化和拓展其理论视阈的思想武器。例如,许多学者力图实现环境伦理学与主流哲学观念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富尔茨的《栖居于地球:海德格尔、环境伦理学与形而上学》(1995年)详细考察了“自然”和“地球”这两个概念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地位,认为海德格尔对自然环境以及我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为环境伦理学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基础^[20]。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的生态主义的,它为生态学运动所倡导的持久的见识提供了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据”^[21]。因而,探讨后现代主义思想与环境伦理学之间的关系也成了环境伦理学家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瑞默曼的《为地球的未来而抗争:激进生态学与后现代性》(1994年)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探讨了激进生

态学的三个主要流派(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和社会生态学)的理论得失。奥斯切理格主编的《后现代环境伦理学》(1995年)一书则分别从“语言学与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后现代政治学及其他”、“反思环境伦理学”三个方面阐述了后现代主义与环境伦理学的关联性^[22-23]。

在新兴的绿色思潮中,生态女性主义是最具后现代意识的环境哲学理论。麦尔斯和席娃的《生态女性主义》(1993年)、普洛姆伍德的《女性主义与自然的主宰》(1994年)、沃伦主编的《生态女性主义》(1994年)以及沙勒的《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女性主义:自然、马克思与后现代》(1996年)等著作不仅批判了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普遍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还探讨了如何建构后现代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问题^②。

在现代西方,美国不仅是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大本营,也是实用主义的故乡,实用主义对美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因此,近年来,探讨环境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关联性,阐述某种形态的环境实用主义就成了许多美国学者努力的一个理论目标。在主张环境实用主义的学者看来,实用主义的下述理论观点与现代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基本精神和伦理取向是完全一致的:人类圈在任何时候都是置身于更大的自然圈中,人类圈和自然圈以某种不可能预测的方式相互影响,价值产生于人与环境之间的永不停止的互动过程之中。在这些学者看来,实用主义为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理论基础。

5. 走向全球环境伦理学

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更是需要全球合作与全球治理。因而,挖掘各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生态智慧和环境伦理资

^①See Rolston H. Conserving natural value [M]. N. 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Attifield R. The ethics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M].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ojman L. Global Environmental Ethics [M]. CA: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②See Mies M, Shiva V. Ecofeminism [M]. London: Zed Books, 1993; Warren K. Ecofeminism: women, culture, nature [M].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lumwood V.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M]. London: Routledge, 1994; Salleh A. Ecofeminism as politics: nature, marx and postmodern [M]. N. J.: Humanities Publishing, 1996.

源,实现各种环境伦理智慧的对话与沟通,建构某种具有全球视野的环境伦理学,一直是环境伦理学家们努力的一个方向。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这种努力表现得更是明显。

纳什曾指出,在20世纪60—70年代反思西方环境危机的根源时,对北美印第安人的思想和亚洲宗教及其伦理意含的兴趣,是促使美国宗教“生态学化”的两个渊源。然而,怀特、帕斯莫尔等人却认为,西方的传统价值观完全可以帮助西方人解决其环境问题,把东方价值观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药方是一种误导。

怀特在他1967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明确表示,他对禅佛教“在西方的可行性深表怀疑”^[1]。科布在其《为时已晚?生态神学》(1972年)一书中则认为,①印第安人虽然比欧洲人更尊重自然,但他们对人的生命却缺乏足够的尊重;②印第安人也做出了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③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不适合于人口大大增加了的当代社会。关于以道家为代表的中国世界观,科布认为,它与印第安人的世界观虽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它却未能阻止古代中国的毁林与破坏生态的行为的发生。由于印第安人和中国人的世界观都未能有效地发挥保护环境的作用,因而科布认为,对于西方人来说,更为审慎的做法是努力完善西方的传统,而不是实现与非西方文明的联姻^[24]。在《人对自然的责任》(1974年)一书中,帕斯莫尔公然反对把东方思想引入哲学,他非常担心“印度教和佛教信仰……或亚洲的农业文化”的入侵。他认为,东方思想是神秘的、反科学的,它将削弱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从而危及西方文明的未来。因而,在解决西方的环境危机时,毫无必要寻求东方哲学和东方宗教的帮助^{[7]4-5}。

尽管如此,学者们寻求非西方传统的环境伦理智慧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许多学者认为,美洲印第安人的观念有助于人们环境伦理意识的确立,因为印第安人的宗教中没有狭隘的二元论观念。在印第安人看来,道德共同体是由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组成的,大自然中的所有事物都属于同一个家庭。从伦理学中演绎出来的节制原则,适用于人-环境关系的所有方面。因此,这些学者

认为,有必要复活并传播美国土著人那种尊重土地的深层道德,建立一种以对地球的热爱情感为基础的伦理学^{[5]141-144}。

对亚洲传统思想的研究也为全球环境伦理学的建构提供了必要的灵感。张华荣不同意怀特等人那种认为东方宗教不能为西方的环境问题提供解决线索的观点。他指出,禅佛教能向所有的文化展示,在人和环境的关系问题上,用敬畏和尊重来代替西方的功利主义是完全可能的。曾创立了夏威夷禅宗中心的爱特肯则认为,佛教通过消弭自我,打开了人们通向外界的心灵之路,使得人们能够与宇宙中的所有事物结成一种亲密的团结关系。在他看来,环境伦理学应以培养一种“人与所有存在物之间的亲密感”作为起点,而禅宗有助于培养这种亲密感。雅利则考察了印度教的多神论和灵魂轮回说,并把它们作为敬畏大自然的基础^{[5]140}。1984年,夏威夷大学比较哲学研究所召开了一次以环境哲学为主题的“东西方哲学比较”学术研讨会。从1984年到1986年,克里考特与时任“亚洲与比较哲学协会”主席的阿姆斯主持了一项“作为环境哲学的概念基础的亚洲传统”研究项目,并组织了四次小型学术研讨会。这些会议的一些论文曾集中发表在《环境伦理学》1984年冬季号和《哲学:东方与西方》1987年的四月号上。1989年,克里考特和阿姆斯把与“作为环境哲学的概念基础的亚洲传统”话题有关的论文(有些论文公开发表过,有些则是在发表的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有的则是首次发表)编辑成《亚洲思想传统中的自然:环境哲学论文》正式出版^[25]。该文集的文章以现代生态世界观为参照系,从不同方面探讨了中国、日本、印度传统思想中有关自然的本质、人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观点。克里考特的《地球视野:从地中海盆地到澳洲内陆的生态伦理学述要》(1994年)可视为建构全球环境伦理学的代表作。该书探讨了欧洲(包括犹太—基督教传统、古希腊罗马的神话和哲学、伊斯兰教及盖娅假说)、南亚(印度教、耆那教和佛教)、东亚(道教、儒家)、远东(华严宗、禅宗、真言宗)、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大陆和澳洲的环境伦理思想的基本观点^[26]。这些著作的出版无疑有助于环境伦理学的

跨文化研究和全球环境伦理学的建构。

参考文献:

- [1] White L.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J]. Science ,1967 ,155(3763) : 1203 – 1207.
- [2] Dobel P. The judeo-christian stewardship attitude to nature [J]. The Christian Century ,1977.
- [3] Moncrief L. The cultural basis of our environmental crisis [J]. Science ,1970 ,170 (3957) : 508 – 512.
- [4] Attfield R. Christian attitude to nature [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 ,1983 ,44 (3) : 369 – 386.
- [5] 纳什. 大自然的权利 [M]. 杨通进 ,译. 青岛: 青岛出版社 ,1999.
- [6] Blackstone W. Ethics and ecolog [M] // Blackstone W. Philosophy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 1974.
- [7] Passmore J. 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 ecological problem and western tradition [M]. London: Gerald Duckworth&Co. Ltd. ,1974.
- [8] Hargrove E. Foundations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M]. Lodon: Prentice Hall ,1989.
- [9] Hayward T. Political theory and ecological values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98.
- [10] Goodpaster K. On Being morally considerable [M] // Zimmerman M E ,Callicott J B , Warren K J et al.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London: Prentice Hall , 1993.
- [11] Attfield R. The Good of trees [J].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1981 ,15(1) : 35 – 54.
- [12] Taylor P W. The ethics of respect for nature [J]. Environmental Ethics ,1981 ,3(3) : 197 – 218.
- [13] Routely R. Is there a need for a new , an environmental ethic? [M] // Zimmerman M E ,Callicott J B , Warren K J et al.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 1993: 12 – 21.
- [14] Routely R ,Routley V. Against the inevitability of human chauvinism [M] // Goodpaster K , Sayre K. Ethics and problems of the 21th century.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1979: 36 – 59.
- [15] 艾斯特·罗尔斯顿. 哲学走向荒野 [M]. 刘耳 ,叶平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35.
- [16] 艾斯特·罗尔斯顿. 环境伦理学: 自然界的价值以及人对自然界的义务 [M]. 杨通进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17] Naess A.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 long-range ecological movement [J]. 1973 ,16: 95 – 100.
- [18] Brown N , Quibler P. Ethics and agenda 21: moral implications of a global consensus [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ns ,1994.
- [19] Norton B G. Toward unity among environmentalists [M].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 [20] Foltz B. Inhabiting the earth: heidegger ,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metaphysics [M].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1995.
- [21] 格里芬. 后现代精神 [M]. 王成兵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227.
- [22] Zimmerman M. Contesting earth's future: radical ecology and postmodernism [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4
- [23] Oelschlaeger M. Postmodern environmental ethics [M]. Albany: SUNY Press ,1995.
- [24] Cobb J. Is it too late? a theology of ecology [M]. Beverly Hills: Bruce , 1972.
- [25] Callicott B , Ames R. Nature in Asian traditions of thoughts: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M]. Albany: SUNY Press , 1989.
- [26] Callicott B. Earth's insights: a Survey of ecological ethics from the mediterranean basin to the Australian outback [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Modern Environmental Ethics

YANG Tongji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 Beijing 100732 , China)

Abstract: Ethics is a traditional discipline exploring ethics and morals. In ancient societies and some non-western cultural traditions , pondering 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nature was once an important mission of ethics. However , due to the mechanistic view of nature and the dualism of modern western ethics , the mainstream of modern ethics has been ignoring the ethical dimension of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 and even denying human's ethical obligations towards nature. In many philosophers' opinion , this may be one of the major roots of modern environmental crisis. Thus , to reflect human's ethical obligations towards nature from an ethical perspectiv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ission of the emerging environmental ethics. A summary to the modern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developing trend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will not only expand our horizon and thinking , but also help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reflecting human's ethical obligations towards nature.

Keywords: environmental ethics; ecological theology; anthropocentrism; non-anthropocentric; construct

【责任编辑: 章诚】

(上接第 21 页)

On Leg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in China and its Political Obstacles

HUAN Qingzhi

(School of Marxism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 mass environmental protests occur frequently , with Xiamen PX incident as a case. " Environmental rights of citizens" or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has increasingly attracted atten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law and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With the issue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and continuous modification to the related laws such as "Civil Procedure Law" and specialized law like "Water Pollution Prevention Law" , 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of citizens or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has been improv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Admittedly , however , China's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has not yet reached a historic "turning point" that definitely constitutes the constitutional basis for protecting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ights of citizens. To achieve greater progress in China's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 we may need to resort to more political and social forces , especially from the grassroot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protest; environmental rights; citizen environmental rights; legislation; political obstacles

【责任编辑: 章诚】